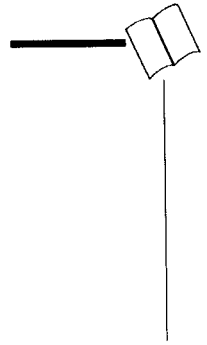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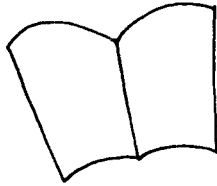


中国百年书评选





1950 ~ 1978





这一时期是现代书评的成熟时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历史，这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从此，中国人民当家作了主人，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书评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时期，书评工作是在共产党、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的。书评作为宣传工作的组成部分，被纳入到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之中。国家新闻总署、出版总署、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发布文件，要求各级部门重视和加强书评工作，使书评事业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这一时期书评的主要特点，首先是按照党的要求，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其次，群众性的书评活动较多，书评文章数量大大增加。1949年至1952年，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评辞书、社科类图书、文艺类图书、政治类图书的文章就有274篇。1958年、1959年、1960年三年中，仅评哲学类图书、历史类图书的书评文章就有134篇，文艺评论更多。这些文章，除少数是名家所

写，绝大多数都是一般作者所写。这充分体现了书评的群众性。

第三，书评以评文艺作品为主，遍及其他各个门类，品种多样化。它们包括对政治、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经济类图书等的评论。文学作品评论中，以评苏联小说为主。如对《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的评论。

第四，百家争鸣，开展批评多，特别是 50 年代初期，气氛祥和，评论环境和谐。1957 年以后，评论中已有“左”的痕迹，过分强调政治性，有以批评斗争为纲的影子。“文化大革命”前后，正常的图书评论不能开展。

经过再三斟酌，本书选了这一时期的书评文章 71 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阶段的书评面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选“文化大革命”中的书评。这可能是一个缺陷，但是，我并不想弥补它，且由它去吧！





冯雪峰



柳青的《种谷记》

我认为这部小说的价值，是在于它把当时共产党抗日根据地陕北的一个村庄的面貌，介绍给我们，介绍得非常精确和非常详细。这个村庄，和陕北其它的村庄一样，在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领导之下，通过减租的政策和集体互助以增加生产的变工的号召，正在改革着和进步着。这种改革的性质，和进步中的问题，是都已经写出来了。也写出了在这种改革运动中的农民，如中农王克俭，雇农王加扶，贫农王存起，……等等，写得非常真实，并且精确。我有这样一个感觉：譬如写人物，王克俭不用说了，一切都是照这个人原来所赋有的样子，不加改易地加以十分周到的分析和描写的；就是王加扶，这个农会主任，也是照他原来的样子，不曾有过什么“增加”。其他的人物，也都一样。总之，这书中的人，以及事，我觉得都是不曾被典型化过的人，以及事。这些人和这些事，使我们觉得不但真实，并且真实到非常精确的地步。我觉得这个精确和详细，就是这部小说的价值。这是我们认识农村和它的详情细节，以及农民们的真实性格的很好的实际材料。

那些空洞的，以及过于粗略的作品，不用说了。就是那种虽有别的优点，然而非常使读者怀疑那里面的人与事的真实性的作

品，和《种谷记》这类作品相比较，我还是觉得后者要有更多的价值。无论怎样，我们也总能从《种谷记》这类作品里，得到一些我们研究和理解在革命中的农村关系和农民生活的可靠的真实材料。

这种材料，虽然我们可以在文学作品以外去更多地得到，但在现在，这在文学上是更可贵的。假如它能够取得文学的更久的生命而留传得更久，在将来也自然还有意义。在现在，不用说，这在文学上是越丰富越可贵。

因此，我觉得，这部小说，虽然在创作的方法上我以为有值得讨论的问题，但仍有它的并不小的价值，我们绝不能因为写的方法上的问题而抹杀它。我们耐心地细读它，对我们仍是有益的。

在书中，也有好多地方写得极活泼，极优美的。例如写六老汉，善人王存恩，反动富农王国雄等人的某些段落，刚才魏金枝兄也说到过了。我觉得写王存起老婆，所费之辞最少，而更成功，作者在这种地方用笔经济而能达到“传神”的效果；这个为我们所敬爱的女人，虽在书中的地位很不重要，给人印象却明白的。善人王存恩，反动富农王国雄，纯粹保持着旧社会的灵魂；六老汉已经有新的思想和生命；王存起的老婆——郭香兰（妇女会主任），是革命中产生的新人。这里证明作者对新的和旧的社会（陕北农村）是都很熟悉的。但此外，写王克俭，王加扶，王存起，以及其他的男人和女人，也都有极好的段落。如王克俭和王加扶这两个书中重要的人物及其家庭，真实是不用说了，给人的印象也还是清楚的，就只是不够“深刻”，不够“动人”，不够“典型性”。这里，我想照我的理解试来谈到一点这部小说的创作方法上的问题。这是我刚才以为值得讨论的。至于书中很多地方写得很“呆板”，没有生气，以及某些文字上弄巧成拙的“做文章”，和刚





才魏金枝兄所说的某些“贴上去”似的描写，我都想不说了。

我觉得，说到“典型性”，例如，王克俭，是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典型性的。这也许因为王克俭被写得更多，所以他更达到这地方。但我觉得，王克俭这人原本就是非常典型的人物。

王加扶和书中的其他的许多人物，尤其故事发展上所必要的人物，也都是富有典型性的人物。至少，也都是能够被深掘、被推广、被发展和被塑造成为典型人物的。

照我的理解，任何一个真实的人，都富有典型性的，都可以被深掘、被推广、被发展和被塑造为典型人物的。每个实际生活中的真实的人，都是典型的粗坯和材料。问题只在“加工”。而且，问题只在于是平面的加工呢，还是立体的雕塑式的加工。是锦上添花式的现象上的精磨细琢的加工呢，还是深掘的、推广的、概括和透视的发展的加工。

我们都知道，“典型化”决不会失去真实和精确。并且，概括也决不和详尽与生活上的细节相冲突。事实上，倒是相反的。我们都知道，典型化是更大的真实，虽然不一定样样都与事实相符，但也仍不妨碍在叙写上的合情合理的精确。概括，在典型性的创造上，是和典型化同义语。因为概括如果带来了或提高了思想性，如果使内容和人物性格更丰厚、更深刻和更广阔，那么，一切的精到的分析和详尽的描写，都将栩栩如生，富有生命和动人的力量了。但因此，非常明白，典型化就并非平面的加工。而概括就反对某些不必要的详尽和重复，某些没有反而更好更有力的琐碎。同时，典型化和概括，也自然就非有“增加”、深掘和发展不可了。

现在说到这部小说，它的内容和人物，都是很真实的，但为什么不动人，给读者的影响不深刻呢？很明白，这是写法上的问题。作者只在求平面的加工。重要的关系，我觉得就在这里。

我们已经说过，真实是最重要的，这是文艺的基础。但只是从平面上表达出了真实，那真实就还不够是全部，不够是透入和深广；因此，这真实作为现实的真理就不能在艺术上达到一种动人的力量去逼迫读者更深刻的承认和感受。为了真实，是不必拒绝典型化的方法的；倒是相反，应该欢迎和做到典型化。但平面的加工和单是精细的描写，却不能做到我们所要求的典型化。

我们也已经说过，详尽和精确也是很有价值的，但为了详尽和精确，也正不必拒绝概括和有所节约。倒相反，能够概括和有所节约，则详尽和精确也更为可贵，成为更有生力和优美而更为读者所喜爱了。

这部小说，我觉得，其中事件的矛盾发展的分析是不够深刻的。人物的思想意识的分析也是不够深刻的。因为对现实的矛盾发展的透视不够深入，作品的思想主题就显不出强大的力量，作者自己对于现实也好像处于被动的地位。代替对社会和人物的阶级矛盾和事件本身在发展上的矛盾之更深入的分析，作者毫不厌倦地从事着现象的琐细的描写。其实有些描写，却是太费了。

作者是一个革命的人，从事着实际工作，忠诚地为人民服务，所以从思想观点上说，我们绝对不能把他和自然主义混一起来谈。因为自然主义主要的坏处就是对客观现实的宿命论的观点。自然主义的被奴役于现象以及烦琐的描写，是从宿命论的思想根源出发的。不过，现在我们的作者手法上的这种缺点也有近似自然主义的倾向，这却可以说的。这种缺点，虽只是手法上的，但也影响到作品思想内容之积极的展开，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例如这部作品，作者服从于事实的情景，就显然超过了他服从于主题应用的积极性的展开。因此，这部小说，我觉得，我们读后，那种足以引导和鼓舞我们的强大的力量，是缺少的。

以上是我的感想。





王西彦

◎

一本血写的书

——讲述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的故事

【编者语】王西彦（1914～ ），浙江义乌人。1913年就读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先后任桂林师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院中文系教授。1940年后，历任中南文联、华东文联筹备委员，上海市文联委员，作协上海分会理事，《文艺月报》编委等职。1955年开始专业创作，著有《夜宿集》、《寻梦者》等10多个短篇小说集，《古屋》、《微贱的人》等7个中篇，以及《第一块基石》、《论〈红楼梦〉和新旧红学》、《严峻的文学》等。

《一本血写的书——讲述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的故事》评论的是捷克政治领袖、作家尤利斯·伏契克的《绞索勒着脖子时的报告》（有的译成《绞刑架下的报告》）。王西彦怀着崇敬和深厚的感情，浓墨重彩地写了这篇书评，宣传伏契克的崇高精神，通过评论号召人们学习这种精神。本书还选了他的另一篇书评《读〈山乡巨变〉》。《山乡巨变》是周立波的长篇小说。评论分析了作品刻画人物的成功，以及作品的风格“明朗、朴素、自然”。

“尤利斯·伏契克给我们讲述了捷克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

的故事。”

——伊里亚·爱伦堡

当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所设立的国际和平奖金评议委员会公布，捷克的为人民所热爱的作家、政治领袖、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权力》的主编和党中央委员尤利斯·伏契克获得特别荣誉和平奖金时，我正在湖南东部的乡间。我从报纸的简短的报道里，知道了这个消息。我所能读到的，只是一张以农民为对象的通俗报纸，所以对于国际和平奖金的获得者，并没有详细的介绍；不过也简单地提到了，伏契克是以他的遗作《绞索勒着脖子时的报告》获得和平奖金的。我并没有读过这本书，对于伏契克简直毫无所知。自从在报纸上看到这消息后，虽然在紧张的工作中，我也渴望着能读到伏契克这一本不寻常的报告。我曾经写信给几个城市里的朋友，请他们给我购寄，但一连发了好几封信，都没有效果——在回信里，都说《绞索勒着脖子时的报告》的中译本，就是在城市里也不容易找到。这情形自然使我很失望。

这次从乡间回到城市里来，第一件事情便是到书店里去找寻伏契克这一本书。很幸运，在一家书店的一个书架上，我终于发现了它——我立刻把它买了回来。满怀兴奋的，我把这本薄薄的不到百页的书，在一个晚上读完了。然而，书虽只是薄薄的一本，却有着非常巨大的力量。合上书，我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于是，我又重读第二遍、第三遍。我还用红铅笔在书页上做了记号。有些段落，我读了很多遍。我觉得这不是一本用墨所写的书，而是一本用血写成的书。特别是，用以写成这本书的，并不是一个普通人的血，而是一个有着坚贞意志的共产党人的血。

从这本血写的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的品质。





书名《绞索勒着脖子时的报告》^①，就可以知道它是在一种怎样的情形下写成的。尤利斯·伏契克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尤其是一个优秀的革命家。他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落入当时占领着捷克的德国纳粹特务之手，第二年九月八日被害于柏林。《绞索勒着脖子时的报告》，便是当他被囚在布拉格附近的庞克拉采监狱时所写下来的，后来由他的妻子古丝妲·伏契克搜集整理而成的遗作。

这本书共分八章，前面有一篇“开场白”。从被捕到第二年的六月九日，纳粹特务要把他送往柏林时为止，他写下了监狱里的种种情形，种种可爱和可憎的人物，作为一个革命者的伟大的理想，钢铁似的意志，以及他的对于苏联的热爱，他的对于祖国和人类的前途的坚定不移的信心。他写得动人极了。他写的乃是一首最美的诗，因为，他有着最美的品质，他写出了比死更强的生命的力量。虽然他明明知道，他是不会再活着出监狱的，残酷的纳粹特务势必毁灭他的肉体（正因为他们知道决不能挫折他的精神），但在他的报告里，却充满着信心，充满着热爱，充满着乐观的口吻，特别是，充满着自我牺牲的精神。

他在被捕的刹那间，就表现着这种不可企及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他自己这样描述那时的情形：

“……特务扭断大门枢纽，进入厨房里，然后进入房间。一个，二个，三个……九个人。他们没有看见我；我站在敞开的门后墙角处，在他们的背后。我可以从这儿射击。但九只手枪对着赤手空拳的两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如果我射击，

① 我所读到的，是一九四九年五月由新中国书局印行于香港的，书名为《绞刑架上》，译者为刘远逸。此书于一九四八年二月由大连光华书局出版时，书名译为《绞索勒着脖子时的报告》——这个书名较为通行，也较为明确，所以我就采用了它。

他们首先被打死。如果我用手枪自杀，他们仍然不免要做牺牲品。如果我不射击，他们在狱中坐上一年半载，到起义的时候，他们便得解放。只有米列克和我没有救星，他们一定折磨我们……我思索两秒钟，或者三秒钟吧？……我由躲藏的地方走出来。”

尤利斯·伏契克就是这样被捕的。——一开始，他就以自己的不可避免的拷打，换取了五个同志的生命的可能保全。

是的，拷打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异常残酷的（你不能希望一个纳粹特务不做残酷的事情）。被捕后的伏契克，立刻遭遇了法西斯匪徒无比地惨烈的拷打。牙齿被敲掉，头发被拔掉，殴打纷纷地落在他身上，“仿佛棍子钻进了脑髓里”，“然后向我浇凉水，然后又是殴打，又是浇凉水”，“我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千奇百怪地疼痛着”，“知觉又离开了我。我找我的脉搏，没有找到它。心提到喉咙，又急剧的落下去，我也落了下去”。别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说：“可怜的朋友死了”。然而伏契克竟没有死。连监狱里的医生也惊叹说：“不是人，是一匹马！”

多坚强的生命呵！

然而，更坚强的是他的理想和意志。当他在遭受着惨酷的拷打时，对于审问他的纳粹特务，他依然有着可惊的倔强：

“——难道你不明白吗？一切都完了，你们输了。你们所有的人都输了。

——只有我一个人输了。

——你还相信共产党会胜利吗？

——当然相信。

——他还相信吗？——科长用德国话问细长个子特务翻译。





——……他还相信俄国胜利吗？

——当然相信，别的可能是没有的。”

法西斯匪徒虽能用暴力毁灭他的肉体，但绝对不能毁灭他对于胜利的信念。这便是不可屈和不可胜的。在拷打之后，处身于生死之间时，他这样写道：

“我爱生活，并且为着它的美而去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都不要唤起悲哀……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

一个爱生活、爱人类、能为欢乐而死的人，在这世界上，自然便是一个最强者。因此，当他被关入监狱之后，他便宣称说：

“人类在走向进步的途中已经上过了几千牢房呢？并且还要经过几千牢房呢？暂且还看不见尽头。但世界是不会在冬眠中再沉睡了，不会沉睡了！”

正由于这样的信心——“世界是不会在冬眠中再沉睡了”的信心，所以，即使是受了那样的酷刑，被投入“常常死掉那些看来应该活着的人们，但很少发生大家都相信他不可避免死亡的人而不死去”的监狱之中，他也是很乐观的。看吧，这便是伏契克所写的：

“我们歌唱着。我们歌唱着，当我们愁闷的时候；我们歌唱着，当阳光的白天出现的时候，我们用歌送别那大概永远不会再见的同志们；用歌欢迎那从东方传来的好消息；我们为了自慰而歌唱，由于欢乐而歌唱。只要生命一天存在着，人们在久远的过去歌唱过，在未来还要歌唱着。”

是的，“没有歌儿便没有生命，正像没有太阳便没有生命一样”。这话，我们换一换说，没有理想便没有生命，理想便是生命的支柱。

中国百年书评选

“五一”节到了，是一九四三年的五月一日。即使在监牢里，新世界的战斗力量依然是存在的：

“今天没有那前几年在布拉格街道上喧腾着的嘈杂的成万的人流，没有我在莫斯科所看见的景象——充满了红场的无边无际的人海，这儿既没有数百万人也没有数百人。这儿仅有几个男女同志。然而你仍然觉得这个新世界战斗力量的检阅的意义是多么伟大。是的，是伟大的，因为这是那样一种力量的检阅，这种力量现在洪炉中锻炼，它不是变为灰烬而是变为钢铁，这是在战斗的时刻在战壕中的阅兵式。”

既然是这样，那么怎样把这种胜利的信念传递给别的同志们呢？——即使在监牢里，办法也依然是有的。叩打墙壁，偷偷地握手，同志们利用着一切的可能。而且，他们还用这样的动作来纪念这个节日：

“现在轮到我們散步。我率领着：同志们，今天是五一节，今天我们用特别的方式进行，就让看守人惊奇好啦。第一个动作：一——二，一——二——用斧头击打。第三个动作——镰刀。镰刀斧头。一点小的想象——同志们都懂得：镰刀斧头。”

他们这样做，别的人也模仿着这样做。大家的脸上都浮着微笑，都懂得这个意思：

“是的，同伴们：这是我们五一节的纵队，而这个哑剧是我们五一节的宣誓：我们赴汤蹈火，但是决不叛变。”做完了这样的动作：

现在克里姆宫的钟塔上敲打十下，在红场上开始了检阅式。……现在那儿正唱着“国际歌”。这支歌从世界各处发出来，让我们在我们的牢房里也唱它吧。我们歌唱着。唱完一个革命歌又唱一个，我们不甘孤独，而且我们也不是孤独



的，那些现在自由歌唱的人们是同我们在一起的，那些现在像我们一样进行战斗的人们是同我们在一起的……”

这是很自然的，人类之中的最大多数都是和他们在一起的，在世界各处，甚至在监牢里，在穿着捷克警察服的人们中间。就是穿着捷克警察服的人们中间的一个，给伏契克拿来纸和铅笔，让他把监狱里的一切情形写下来，然后再把这些稿子带出监狱去，为的是在将来有一天可以问世。自然，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为了这么一小块纸，他们是付以头颅的代价的。他们所以冒这个险，为了是不让在系着锁链的今天和自由的明天之间的联系中断。他们是战斗的参加者，他们勇敢而坚决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在那进行战斗的地方，用他们手中能够有的武器战斗着。他们简单而不被人注意地做着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且谁也不知道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他们同自己的朋友一起不是战胜就是战死。”

战斗是无处不在进行着的，所以，也就无处没有英勇的战斗者。这便是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一个战斗者决不会孤独，也就决不会失败。

然而，战斗毕竟是艰辛的。在人类中间，有战士，也有野兽；有英雄，也有懦夫——用伏契克的话来说，便是有“人”，也有“木偶”。他在《绞索勒着脖子时的报告》里，用两章的篇幅来写这两种人，题名便叫做“人与木偶”。伏契克很重视人，认为“人是最重要的”，所以他特别来描述人的肖像。对于敌人即“木偶”，他用的是一种憎恨和嘲笑的口吻；而对于同志即真正的人，他有的便是热烈的爱和热烈的希望。他认为监狱引导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在紧锁着的牢房里，另一种则是在牢房的外面。这第二种生活，“在长的走廊里，在半明不暗的地方”：这正是“许多木偶和不多人类的世界”。伏契克这样写道：